



「路口」餘塵

高天生

主編先生大鑒：

八月初寫給您的書簡中，我曾表明希望文壇熱鬧些，由於個人現在身為化外之民，故對近來文壇是否熱鬧起來，實無由得知；但讀完九十期（十月號）「書評書目」，却發現貴刊近來實在熱鬧極了；尤其看到那麼多門大炮，「不約而同」地對準林雙不先生，心裏的感覺則是過於熱鬧了。

閒言表過，言歸正傳。我所以要提筆寫這封書簡，完全是爲着駱梵先生的緣故。我在八月初寫的書簡（刊於九月號「書評書目」），批評了詹宏志先生對陳若曦「路口」一文的評介，而駱先生則是對我的意見有意見，而寫了一封書簡登在十月出版的「書評書目」上。

本來，對於辯論我並沒有很大的興趣，但因為駱先生對本人的意見有些微地方加以扭曲變形，「差以毫釐，失之千里」，茲事體大，有加以說明的必要，同時駱先生有些觀點，在我看來非常奇怪，「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」，因此，我不得不避多事地又寫了此封書簡。

首先，我把駱先生奇怪的觀點摘錄出來，以饗同好：

「……唐先生的『進入歷史』是指這位作家不朽，而非列名文學史；產量多、讀者多的張恨水、張資平、馮玉奇、瓊瑤、禹其民等人都會在文學史上列名……」（第八十四頁第十行）倚多爲勝，雖勝不武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，（但在某些「爲達目的，不擇手段」的人

來說，雖勝之不武，但他畢竟是勝了。駱梵先生強作解人，越解是越令我迷糊；但其勇氣十足，應得「最佳勇氣獎」，把張恨水諸人單純以「產量多，讀者多」的理由通通有獎地列入文學史，可謂見解「獨」到，個人自嘆不如！（相信駱先生若執筆寫文學史，必有可「觀」。）

其次，說說個人意見被扭曲變形的事。

在駱先生的書簡裏，他將我的意見「割裂」成五個，其實，我的意見只有一個，那就是駱先生所謂「⑤內容和技巧，有時並不能一分爲二，內容就是技巧，技巧也就是內容，（它們是一體的兩面）。」不知是有意或無心，駱先生將原文省去了「它們是一體的兩面」等八個字，並將「內容」下面的逗號改成句號。至於駱文所指涉其他四點，都是細枝末節，在此不一一贅述。

我想，我還是要把白先勇的一段話摘出來，因爲那段話太重要了！白先勇說：

「沒有偉大的作家會爲了表現某種文學技巧、形式來寫小說，一定是先有了題材，才找最合適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它的內容，愈深奧的題材所需要的技巧愈高……。」（胡菊人：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）

這是一個創作者寶貴的經驗之談，我們沒有理由棄之如敝屣；同時，在陳述相類似的看法時，我們更沒有理由悶聲不吭地據爲自身的創見；這是爲學與屬文時最起碼的虛心和誠實。如果駱先生認爲個人乃在挾名言以自重，那我亦無言。至於駱先生又說：「寫作像果樹結實，各年有異，而不若品質管制嚴格的工廠產品。不但年齡影響其作品，忙裏偷閒趕寫和聚精會神地點染，成績亦殊。」這些話表面看起來是在爲陳若曦開脫，但以陳若曦創作態度的嚴謹和虔誠，這些話不啻是莫大的諷刺、侮辱，我建議駱先生不妨再仔細讀讀陳若曦的小說，或許會有些新的發現。

誠如駱先生所言，詹先生寫評介的目的「在提示讀者看小說的門道，作品風格，也提示習

作者兼顧藝術，別做一個名實相副的說故事人。」然而，我藉着書簡提出一些質疑，則是要提醒看評介的讀者，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，莫要把評介者的意見看得太重，甚或如聖經般不可更改，要擦亮眼睛，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，更進一步要去「參予創造」，不只是「聆聽雅教」就算了。在基本上，我並沒有否定詹先生的評介的意思；相反的，對於詹先生的敬業精神、負責的態度，個人只有尊重和崇敬，而其在小說批評上的建樹、成就，更是有目共覩、有口皆碑，不在話下。因之，我的動機實在也很單純，只不過是有「理」取「鬧」罷了。試想，如果只是一個人在唱獨腳戲，而觀眾却一無反應，那情景多尷尬？

其實，我對「路口」及陳若曦小說藝術上成就的看法，所以會和詹先生有所出入，主要癥結乃是因為我認為內容和形式有時並不可分，我們將之分開來說，只是為了討論或解說的方便，並非真的將之剖析開來，而詹先生則不然；駱先生對我有意見，則是因為他贊同詹先生的看法，而認為「內容與技巧不可分的論調，亦不實在。」

關於內容與技巧究竟可不可分？這個問題討論起來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解決，也不是本書簡格局所能容納；同時據我所知葉維廉先生在「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」（一九七七：四季出版社）、「飲之太和」（一九八〇：時報出版公司）兩書中，有精闢和深入的論文專門討論，如果有興趣可參看，個人在此不願喋言。

最後，在結束本文之前，我想順便再談一談「路口」及「城裏城外」。

李歐梵先生發表於九月廿二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精彩論文「偉大作品的條件——談文學創作上的『構思』」中，曾提出一個大膽的看法，他說：

「我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危機是由兩種因素造成的，一是狹義的社會性和愛國思想，一是創作上寫實主義的傳統。」

但是我認為陳若曦的「路口」，已超越了這種危機。細心的讀者，一定會和我有相同的發現，那就是陳若曦一開頭對路口景致的着墨，並不是無的放矢，而是別有深意在焉。

「……最吸引人的是一只郵筒，不時有車輛停下來投郵，一塊標明『此巷不通』的牌子並不太起作用，仍然有不少汽車誤闖進來，在窄巷裏折騰了一番，才掉頭悻悻然離去。」

小說的開展，便是圍繞着這「路口」的景致和文秀的心路歷程而進行。文秀的故鄉是東港，她離開故鄉奔去美國是爲了和丈夫團聚，但和丈夫不幸此離，却又陰錯陽差地撞進死巷，掙扎一番，又終於擺脫方豪的糾纏，奔回臺灣。文秀這心路歷程正如誤闖進窄巷的汽車；而在文秀觀照下，方豪、文娟諸人，又何嘗不是不顧「此巷不通」的牌子，而撞進死巷的車子呢？只是他們還在掙扎，還未掉頭出來罷了！

從這個角度觀照，「路口」中的世界，不僅是寫實的，也是象徵的；不僅是「外在」的，也是「內在」的。同樣的，我認為陳若曦的「城裏城外」也當作如是觀，表面上它是描寫中共的一個訪問團到美國訪問的事，其深一層象徵意義則是城外的人想往裏鑽，城外的人却想往外逃的富有寓言性質的故事。將「路口」「城裏城外」兩文並觀，其意義更加豐饒。因此，某些人所謂陳若曦小說藝術成就不高，個人甚覺納悶。

李歐梵先生在我們前引的論文中又提到：

「臺灣文學近年來非常蓬勃，佳作屢屢，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，然而我總覺得臺灣文學在技巧上雖早已超越卅年代文學，但在構思的幅度和思想的深度仍嫌不足……。」

我在想，這種現象是否因我們的大多數批評家，總是斤斤於技巧的講求，以致對創作者發生一種導誤作用呢？若果如此，我們的批評家真應該好好檢討一番。

端此，即頌
文祺

高天生 敬上